

doi: 10.3969/j.issn.1007-6522.2014.01.009

空间视域下《浮现》对工具 理性霸权的批判

王影君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093)

摘要: 工具理性霸权源于现代社会人类对知识及其技术产品极度推崇的信仰,体现为对绝对技术理性的追求,贬斥了人的感性价值,造成了人性的异化。根据后现代空间理论,这种异化总是凭借资本向乡村空间的流动,以机械文明对乡村空间的侵入为表征,从发达地区蔓延到发展中地区,客观上提出了人性救赎的问题。阿特伍德的小说《浮现》生动地展现了这种蔓延,并通过对工具理性霸权所造成的人性异化的描绘,对其展开揭露和批判,同时提出回归自然的人性救赎之途。《浮现》在创作理念上远超过一般的生态女性主义作品,在全球化背景下独具现实意义。

关键词: 阿特伍德 《浮现》; 工具理性; 霸权; 自然生态; 空间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6522(2014)01-0099-10

一、工具理性霸权及其批判

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①是指人作为实践的主体以知识和技术作用于实践的客体的能力。自14世纪文艺复兴起,人的

主体性在反对宗教神学的桎梏中获得了不断的张扬,尤其是在经历了18世纪的理性主义启蒙运动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身能力的自信不断增强,这种极度膨胀的自信,使人对其社会实践中的对象化产物

收稿日期: 2013-04-01

基金项目: 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L11DWW005)

作者简介: 王影君(1973-),女,吉林四平人。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①法兰克福学派最早对工具理性进行了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1920年发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最早提出工具理性一说。此后,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道尔诺(Theodor Adorno)在1947年发表的《启蒙辩证法》,以及1967年霍克海默发表的《工具理性批判》中都指出后工业时代工具理性对人实现了多维度的纵深操控,形成了工具理性霸权,并由此造成了人性的异化;1968年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则在《单向度的人》中,从哲学角度全面论证了工具理性霸权对人及人类社会的全方位攻陷。

工具理性变得越来越欣赏和依赖,于是新的神性崇拜诞生了,这就是工具理性崇拜。工具理性崇拜表现为人类对自己掌握的知识及其技术产品的极度推崇信赖,在社会生产活动中以知识或技术所能达到的最大效果为目的,追求绝对的理性价值。工具理性使人们相信“科学和知识万能,文明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依靠科学技术本身就能得以解决”。^{[1]89}其负面影响表现在高扬理性的同时,人的感性价值在客观上遭受到贬斥,促使人性自神性的解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走向了工具理性的压迫,由宗教神学解放出来的人不幸沦为工具理性的囚徒。工具理性对人类强大的压迫和统治力量就是工具理性霸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的后工业化时代,工具理性霸权彰显出狰狞的反人性面目,遭到了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前仆后继的文化批判。

值得反思的是,在历史发展的螺旋式轨迹中,人性恰恰因为工具理性带来的主体性狂欢,造成了自我感性价值的失重,人的主体性在理性和感性的天平上出现病态分裂,呈现出人性的压抑。于是在资本主义不断采用高科技机械化的生产过程中,正如马尔库塞所说“人的个性在社会必需的但却令人厌烦的机械化劳动过程中受到压制。”^[2]所以,马克思认为是现代化机械生产造成了劳动的异化,进而造成了人性的异化。可见,正是基于对工具理性盲目的依赖和崇拜,人类亲手建构了工具理性霸权。工具理性霸权促使人性出现自虐性的自我放逐,即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人性的异化。法兰克福学派则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现代的机械化大生产之所以能够建立,其信念源于欧洲文艺复兴后对工具理性至高无上的追求,即对工具理性霸权的推崇。一言以蔽之,人性的异

化源于工具理性的霸权意识。那么,为了人性在后资本主义时代实现异化后的再次解放,工具理性霸权必须受到批判,其深层内涵是人类必须对资本主义机械化的生产方式进行反思,必须对知识和技术给予重新价值定位,以此重新确立人类自我的主体性。而这种自我主体性的重新定位成为资本主义后工业时代文化批判的主要任务,主要表现为对启蒙理性以来的现代性及人之生存境况的反思。事实上,很多后现代理论思潮,其批判手段都是对作为宏大叙事的、大写的、凝聚着整体性和同一性特征的“人”的解构,由此显露小写的、有着各自身份地位、各种感官需要和欲望追求的活生生的具体的人,所以对工具理性霸权的批判体现为对个体生命体验和人性欲望的尊重与肯定,以此治疗人性的异化,恢复人性的自由。

工具理性霸权对人性自由的摧残集中体现在生态女性主义经典作品《浮现》中。这部作品描写了乡村空间在经历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人性的迷失,表现了主人公对工具理性霸权的排斥和对生命自由的追求。这部小说诞生于众声喧哗的20世纪70年代,当时资本主义刚刚进入到后工业时代,其中美国经济进入飞速发展的快车道,金融资本向加拿大等周边国家大规模流动。法兰克福学派具有预见性地掀起了工具理性霸权批判思潮,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引发美国民众的生态环保运动方兴未艾,黑人的民权运动和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同仇敌忾。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世界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 1939-)以一种文学审美的先锋性批判意识,把握住了时代遽变的脉搏,创作了这部反机械文明的作品。此前国内外有关《浮现》的研究论文多围绕着女性主义生态批评

的话题展开,笔者却认为其最深刻的价值意义并不止于此。《浮现》最超越于同类作品的地方,在于其在生态问题 and 人性化问题的根源上做了揭露,即以文学的形象化语言对工具理性霸权进行了抗争和批判,以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很好地揭露了工具理性霸权所带来的人性异化和生存空间的困境,这使得它在文学史上较早地抒写了后人道主义时代的人性救赎问题。

二、工具理性霸权以美式资本形式入侵乡村空间

《浮现》在空间生产流动的今昔对比中表现了工具理性霸权所带来的人性的异化。法国的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1901-1991)把资本主义工具理性化的生产视为空间的生产,空间生产的主要特征是城市化,城市化把人分配隔离在各自的空间中,^{[3]130}按照工具理性秩序的规划进行着模式化的空间生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在这种工具理性的空间中得到维持。^{[3]136}人性的异化总是凭借资本的空间流动,从发达地区蔓延到发展中地区,从都市蔓延到乡村。《浮现》叙述了一位已成年女儿回到久别的故乡寻找失踪父亲的故事,借此表现了资本的空间蔓延和空间城市化后人性的异化,并在思想深度上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工具理性霸权。

小说对工具理性霸权造成人性异化的叙述,紧紧围绕着资本的空间流动而展开,小说一再表现出主人公对美国资本流入及其理性霸权的愤慨。美国作为帝国主义链条里的龙头老大,其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与文化,恰恰是最严重的工具理性霸权统治的结果。美国资本的向外扩张正是工具理性霸权势力的空间蔓延,也是人类异化走向更深度化的脚步。小说中,美国资本从都市空间侵入乡村空间,

即主人公的家乡“湖区”。伴随着美式资本带来的乡村空间城市化,村民被新兴的都市空间格式化,其表征是以工具理性霸权意识为特征的美国资本文化及其现代化生活方式很快征服了湖区,人在这样的空间变换过程中变得冷漠,人性异化的端倪尽显。美式霸权作为资本主义都市空间的生产逻辑,显现出狰狞恐怖的现代性面孔。作者通过对湖区美丽景致的描绘和昔日淳朴民风的回忆,衬托出美式霸权面孔的可恶。《浮现》中不断穿插着主人公的记忆,通过电影蒙太奇式的频频闪回手段,不断加重对湖区美丽的描绘,最终营造出一座动人心怀的人间伊甸园,即作者心中的生态乌托邦。但是,以“现代性原始版本”^[4]著称的美国裹挟着强大的机械技术实力及现代资本势力入侵了湖区。

因为美、加两国空间位置的关系,美国资本对加拿大乡村空间的入侵体现着一种自南向北的流动性,理性霸权带来的城市化也便由南向北蔓延开来。加拿大南部的淳朴乡村最先承受了城市化带来的生存空间的改变。小说中当主人公因父亲失踪,离开喧嚣而冷漠的都市空间,重返充满童年记忆的乡村空间时,发现了都市资本对乡村的入侵,心中的故乡即将成为永远的故去之乡:“道路蜿蜒曲折,绕过湖岸,岸边的白桦树就要死去,它们患上了从南方传染过来的什么树病。”^{[5]3}这里的“南方”是阿特伍德笔下的一个具有理性批判内涵的空间名词。因为“南方”在加拿大是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更远的国境之外的“南方”则是美国,是整个北美乃至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被乔姆斯基、布鲁姆、皮尔格和C·约翰逊称为地球上最大的“流氓国家”的地方。“南方”以其特定的所指进入这部作品,它代表着人类技术达到的最高境界,代表着工具理性肆意泛滥的现代都市

生活的价值观。它一面承继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硕果,一方面以此无情地诱惑着质朴的村民,侵蚀着古老生态文明中的自然与人性的和美,强行推进最具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空间表征的都市文明。南方作为以技术革命征服自然空间的都市文明,充分地展现出强悍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霸权利度,它不但因为化学工业的泛滥,残酷地传播着植物疾病;更是以自己占有世界主导霸权地位的技术话语权,传播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病;以目的至上的工具理性的价值观割裂了人与自然的联系,把人的身体空间变成自然空间的对立物;把人变成对自然界进行肆意索取和恣意破坏的恶魔,变成不断享受资本无限扩张欲望的狂欢之物。一句话,推崇金钱至上和技术万能的工具理性霸权,正改变着湖区淳朴的人们,使之逐渐失去赖以生存的乡村空间,日益被挤进都市空间的某个角落。

工具理性霸权对乡村空间征服体现在物理空间和意识形态空间等多个层面。小说中工具理性霸权裹挟着资本的侵袭带来乡村空间的变迁,在物理空间的层面上具体表现为美国投资人对乡村面貌摧残性的改变,以及乡村宁静的生活因城市化而荡然无存的转变。打着美国国旗的投资人,来到父亲口中曾经声称的“除了过去,什么都没有”^{[5]5}的北方湖区,充分施展了流氓式霸占的强悍和自由。“工具理性只关心实用的目的,以及实现目的的手段……人成为了金钱、机器和商品的奴隶。”^{[1]90}面对美丽天成的湖区,他们进行了残忍的空间掠夺。他们炸开道路,用拖网捕鱼,恣意地往山崖上粉刷五颜六色的可口可乐广告,在丛林里修筑战时掩体,甚至把曾经的村民变成“新兴的小资产阶级”。美国人的到来,使得工具理性霸权对乡村空

间的入侵无孔不入。宣告着空间征服胜利的美国国旗到处飘扬,加油站、酒吧、餐馆、旅馆、船头和野营地无一例外。工具理性霸权对乡村空间的征服还体现在对村民意识形态空间的影响上。不要说村民,甚至连立在加油站的加拿大驼鹿也在意识形态上被美国化。雌雄驼鹿连同幼崽浑身上下都被美国文化元素包装起来,小驼鹿手上还插着一面美国国旗。阿特伍德通过小驼鹿手中的美国国旗,痛心地揭露出加拿大人即将被工具理性霸权同化的可悲命运。自小被美国化的下一代,将手舞星条旗,更加主动地追随美国的消费观、生活方式、文化形态以及政治和金融制度。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金钱、生产力和军事力量是霸权得以维持的三根支柱。并且,政治势力通过强制、仿效和深化认同来行使领导权。^[6]如此,伴随着资本的空间流动生产,带有工具理性霸权意识的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导权将在湖区逐步确立,在人们对美国全方位的迎合与追随中,消失的将不仅是湖区空间生态的和谐,更有人格空间和国格空间自由的丧失。

工具理性霸权对乡村空间的征服最终将确立一种全球范围的更为广泛意义上的从属关系,制造新的霸权式等级秩序。在资本主义后工业时代,工具理性霸权的最强劲的符号标志就是美国,由此美国成为一个卑劣的现代性象征,成为小说进行工具理性霸权批判的必然的靶子。伴随着美国资本向“乡村空间”的入侵,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成功推销其价值观和美国式的现代化生活方式,贬损、压抑和摧毁别国或其他地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空间征服的霸权逻辑。美国更是以发展现代化经济为旗帜,通过这种霸权逻辑对自然界生杀掠夺。

由于美国文化典型的工具理性霸权效应,越来越多的非美国人正在被改造成价值观上的“美国人”。小说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作品中无辜苍鹭的惨死,原本不滥杀无辜的当地人竟然心安理得地、毫无缘由地杀死了它,淳朴的村民美国化了。对此主人公愤恨地发出叹息:“毕竟是他们杀死了苍鹭!他们来自哪个国家无关重要,我的大脑告诉我说,他们仍然是美国人,他们正在把我们引上歧途,我们也会和他们一样。”^{[5]144}在美国资本、技术和军事的合力下,湖区以及湖区之外的更为广阔的加拿大空间,甚至世界上更广阔空间中的人们,将在文化心理上屈从为美国的属民。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①一如人类强迫自然成为其附属物一样,奉行工具理性霸权的美国会迫使世界上更多的人成为美国文化的属民,即乡村从属于都市,东方从属于西方。在作家看来,一切噩梦的开始皆源于对美式工具理性霸权文化的认同、追随与效仿。尽管世界范围内理性价值的趋同是现代化工业文明不可避免的结果,作家依然希望可以唤醒盲从中的人们,使他们有足够的心性来抵制这一进程。

三、工具理性霸权以机械文明入侵乡村空间

美式资本对乡村空间的入侵具体是以机械技术文明进入古老的乡村为表征的,资本

的征服最终表征为工具理性霸权凭借机械文明对乡村空间的征服。20世纪70年代,各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二战”后经济的复苏,纷纷进入以资讯传播、影像复制、资本全球流动和文化戏仿为标志的后工业社会时代,机械技术文明高度发达。这一时期,美国成为资本主义帝国的霸主,美式现代生活方式的雏形初步形成,美式价值观成为现代化机械文明理念的最合法的现代性表征。跟随着美国资本在全球空间的运转,现代化机械文明攻占了一方又一方的乡村空间,这种圈地式的攻占,呈现出与前工业社会时代截然不同的特征。如果在狄更斯和哈代的笔下城市或乡村在工业前社会化进程中,还闪现着被征服者的愤怒、抗争、疲惫与绝望的话,那么在资本技术至上的后工业时代,大多时候乡村空间的沦陷迎来的则是热烈的企盼和欢呼,贫困乡村的人们是如此渴望资本的流入,渴望城市化的到来,他们对机械技术的应用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崇拜和深信不疑,竟然成为欢欣喜悦的“受难者”。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湖区的人们乐于向美国资本家出卖土地,乐于效仿他们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乐于采纳他们现代化的价值观,甚至模仿他们的语言、旗帜、发型与衣着,喜欢他们喜欢的运动,购买他们的油机船、汽车、啤酒和可口可乐,呈现出一片喜悦的城市化图景。人们热烈地欢迎资本向湖区的疯狂流动,日益沉浸在现代化进程的狂欢里,昔日纯净湖水里不断浮现的机油污渍被彻底忽视。随着现代机械在湖区的不断轰鸣,乡村空间被迫日益缩减。

工业社会机械文明对大自然的空间掠夺,在主人公的眼里俨然一场残酷的战争。

^①具体论述可参见《共产党宣言》。

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空间对决,都市和林地是交战的双方,林地曾经一度成功地把湖区和城市分割,但是林地不断地被镇上的锯木厂伐倒,被抬高水位的水坝也要淹死一些树木,更可怕的是“该死的法西斯蠢猪美国佬”^{[5]6}带来的高度的机械技术文明,得以使他们在湖区的最纵深处留下人工建筑,同时也制造出随处可见的无法在自然循环中被消解的现代垃圾。城市与林地的空间争夺,最终因为金属和化工技术的参战,致使以林地为代表的原生态乡村空间大溃败,以机械技术为代表的现代化城市空间胜出。生态乌托邦的理想栖息地湖区,变成旅游胜地和小商品销售市场,乡村最终无法逃脱被城市化的命运。于是,随处可见的汽车旅馆和招揽生意的霓虹灯,打破了乡村原有的自然和谐的空间格局,肢解了乡村空间应有的宁静,也背离了主人公记忆中的家园。因此,主人公不得不发出感慨“我们已进入我家乡的地界了,那是一块陌生的地域”,^{[5]8}“一切都与从前不一样了,我竟然不认得路了”。^{[5]10}原已在都市空间的机械文明中疲惫了的都市人,即使身体回到了故乡乡村,心灵却再也找不到归家的感觉,因为古老的生活方式正在被机械技术侵蚀。

湖区的现代化发展是以扭曲、异化了的人性为代价的。在乡村空间机械化的过程中,原生态大自然不断萎缩,无辜生灵不断死亡,这些引起了主人公灵魂深处的震撼和悲痛。魁北克乡村湖区原生态的和谐宁静,曾经伴随了主人公美好的童年,湖水、崖壁、树林、松鸦鸟、黑熊等都给她留下过无数美好的回忆。然而随着独木舟被机械船所取代,乡间水畔马达的轰鸣与昔日美好的记忆形成鲜明对比,引发了主人公灵魂深处的焦虑。工具理性文明无疑即将在湖区围合起机械技术

一统天下的无机空间,由森林、草地、沼泽、湖水等自然神力建构的有机生命空间必将被机械征服,先被挤压压缩,再被无情打造成现代化空间模式中的布景和点缀,变成无灵性的机械化镜头中的影像式存在,人在这样的所谓“文明”对“野蛮”的空间角斗中,最终因机械技术造成了人性的异化。正如列斐伏尔所说“机械取代了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梦想、思想、诗意或类似活动所构成的日常生活审美批判,而这些批判使日常生活得以持有自身。”^[7]小说中日常生活因为机械的进入被异化,人生活在收音机和电视机的辐射空间中,生活在照相机的摆拍空间中,以主人公的朋友安娜为代表的女性,“灵魂被锁在金色的化妆盒里面了”,^{[5]220}更是可怜地生活在流水线制造的工业化妆品对人体空间的掌控下,人失去自我,异化为机械式的存在物。为此主人公感叹道“他们正在进化,他们进化成了机器的一半,他们剩余的肉体,萎缩,染有疾病,像满是疮孔的阑尾”;^{[5]231}“机器是渐进的,它每次只吞食你的一部分,直至最后留下你的外壳”。^{[5]208}只有空壳的人类,形同机械零部件,以功能为记忆,以利益为目的,以技术为手段,以工具理性为最高法则。只有文明社会的制度法则,没有真正的灵肉一体的爱与审美愉悦,婚姻只是一纸契约,投资只是“热钱”的系统机械化的空间流动。

在全球化的乡村城市化进程中,工具理性铸造出的机械文明全方位地摧毁了传统的生活模式。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评论的那样“工业主义全球化的主要特性之一就是大机器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工业主义的影响,并非仅仅限于社会生产的范围,而且也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到人类与物质环境互动的模式。”^[8]大工业技术文明引发了人类日益旺盛的物质欲望,为

了追求自身基本生存需求之外的更多的物质财富。小说中的“美国人”不停地聚敛更多的鱼、水、猎物,甚至空气,进行着毫无必要的杀戮。最具有象征意味的还是小说中苍鹭的死,对于这只不可肉食的苍鹭的死亡,杀戮者“只是为了证明他们可以这样做,他们有杀戮的权力”,“他们与这样一个东西的唯一关系就是毁了它”。^{[5]144}这是强权的暴力,是残酷无情的机械化的杀戮行为,是工具理性造成的人性丧失的结果。这种无端杀戮其实出现在湖区外更广泛的范围内,被工具理性支配并控制的人类,使其自身变得盲目自大,唯我独尊,乃至任意杀戮,为了毁灭而毁灭。正如小说中所表现的那样,现代机械文明使人类极度膨胀了工具理性霸权意识,不再顾虑上帝的权威,也不再服从传统的自然伦理,而是盲目相信知识和技术的无所不能,以至于失去自我主体意识而不知。这正是《浮现》要表达的忧惧所在:人正在从对工具理性的沉迷中走向人性的异化。如果继续放纵工具理性霸权,任人类中心主义肆虐的话,最终人将成为机械的一部分,在冰冷无情中走向生存的末日。

四、批判工具理性霸权,寻求人性救赎

工具理性扭曲了人性,如何实现人性的救赎成为小说后半部分要表现的严肃主题。当工具理性成为最高法则,工具理性霸权大行其道,人类的道德理性被放逐的时候,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扭曲,使得自然空间不再是人类生存的理想母体。工具理性导致的人类对

物质利益的过分追求,使自然成为不再拥有生命的可交易物,就连自然界的阳光和空气也可以通过资本的划域功能,被圈定为可供牟取利益的空间商品。后工业时代现代化的机械文明,迅速地完成了对人和自然界的同步异化,正所谓“人类为其权力的膨胀付出了他们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异化的代价”。^[9]《浮现》作为生态女性主义作品,它的独到之处在于并没有把人类与自然置于彼此尖锐对立的位置,也没有把力图改造自然的父亲的形象描绘为父权制社会的绝对权威,相反这是一个通过女儿的探索被证明为懂得了忏悔的父亲。小说中写道“他已经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闯入者:他盖房屋,建栅栏,燃炊火,辟路径,这一切都是在亵渎神灵。现在,他自己建造的栅栏正在拒绝他,就像逻辑排斥爱情一样。他想让这一切都结束,让界线消失,让树林回到被他砍掉前的样子,他想做出补偿。”^{[5]234}可见,在作家的信念中,相对于工具理性的暴虐,人毕竟值得同情,理应寻求人性的自我救赎。确实,相对于机械文明导致的工具理性的霸权逻辑来说,整个人类与自然是被压迫者联盟,不仅仅是女性与自然。所以,主人公在回答亚当和夏娃落水了该救谁时认为两个都该救。这比通常概念上的生态女性主义作品更具有思考和认识的明晰度。^①

为了在机械理性的压迫下重新获得人性的自由,人类必须走上反对理性霸权的批判之路。为此,小说中的主人公进行了顽强的抗争。这种抗争不仅体现在对大自然的热爱

^①大多生态女性主义作品仅仅将女性作为自然的联盟,认为人类对生态的破坏是由男性一元主义中心的权力意识造成的,于是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父权社会的霸权逻辑——菲勒斯中心主义。但是,事实上菲勒斯中心主义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代,而生态危机则是20世纪的事情,所以笔者认为阿特伍德将其归咎于危机所在的后工业时代的工具理性意识更为直接和显在。

上,更体现在对机械文明秩序的主动抵制上。工具理性的功能逻辑事实上深入到社会人生的每一个空间,它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化为一种功能契约的空间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彼此承担的社会功能格外重要,功能的分配靠机械的逻辑支配,人的情感被排斥在功能之外,人们按照契约的关系在各自空间各尽义务,履行职责。这种秩序对大力提倡契约关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们来说极具反讽味道。在《利维坦》中,现代国家被设想为由各个契约组合部分有机构成的巨人——利维坦,这个巨人具有高度的协调和整一性,但是当资本主义秩序进入到后工业社会时代,这个巨人不但没能培养出政治乌托邦理想中的人性,反而越来越成为一架被机械逻辑操纵着的模式化的冰冷机器。这架机器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毁灭性的摧残能量,它将人拖入人性渐趋异化的后人类时代。主人公对于这样的社会秩序选择了对抗和逃避,在小说末尾过起了远离人群的“野人”生活。

小说的结尾设想出一条非同寻常的生态乌托邦式的人性救赎之途,那就是由文明回归到“野蛮”。这样的道路绝然不同于同时代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张。在阿特伍德写作《浮现》的时代,法兰克福学派已经对工具理性霸权提出了文化批判,同时设想出了解决方案,即提倡以审美现代性来对抗工具理性对人性的异化,这种主张至今依然具有影响力。以艺术审美来呵护人性,早在康德的“审美判断力”和席勒的“游戏说”中就已显现,到法兰克福学派获得进一步发展。虽然不能肯定阿特伍德是否有意通过文学描写,在《浮现》中对法兰克福的主张提出影射性批判,但显然她不认同审美现代性具有人性的救赎功能。作品中主人公的职业是插图画家,亲身感受到现代艺术已经被工具理性的

极权力量所侵蚀,高度技术化的工业社会呈现出的整体性规约,致使艺术品的天然灵光消逝,^[10]成为大众消费品。与此相关的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事件是,主人公被出版商告知,儿童读物并不是儿童的,因为掏钱的是他们的父母,所以必须按照成人的审美标准来画插图。而父母们的审美标准又从何而来呢?它来源于后工业化社会单向度的审美期待。充斥于整个资本市场的大众传媒、同一性的价值理念和文化思潮,形成了大众化的审美期待。对儿童故事中“公主”一类形象的艺术创作,只不过是一种标准化影像的空间再生产。艺术家费尽童心创作的插图,因脱离了既定的空间生产的艺术市场,被无情地断然拒绝。于是主人公在湖区人性获得觉醒之后,毅然放弃了这一现代职业,转身去寻找古老印第安人的崖壁画。可见,阿特伍德并不赞同以审美现代性来实现人性救赎的办法,既然现代艺术本身也已经被异化了,艺术自身都已成为一个不得不亟待通过复古来拯救的受难者,还哪有能力去救赎人性?

在人文精神远离了宗教神性几个世纪之后,阿特伍德呼唤着一种自然神性复古,力图以此弥合感性和理性过度偏离的距离,治疗工具理性霸权带来的人性异化,重塑健康的人性。小说结局部分大自然被神性化,带有令人眩晕的神秘主义色彩,带有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的大地母神的神性味道,但是在工具理性无孔不入的后工业时代,人们只能在一丝若隐若现的憧憬中寻找精神慰藉。不知所踪的尴尬正是人类目前空间处境的真实写照。正如一心回归自然怀抱,躲在丛林中的主人公面对食物枯竭,在人们的呼唤声中,不知该出去还是继续隐匿一样。从《浮现》后半部分主人公在大自然中获得人性回归的心路历程,可以推知阿特伍德相信人性在与自然神性的互

动中闪光;无视自然神性,就没有人性。

《浮现》描绘的人性救赎之道,就是人要与大自然紧密相融。小说中,主人公把身体空间作为灵魂应和自然神性的桥梁,确实“身体是自我的一个标志性特征”。^[11]在这一救赎的过程中,个体身体空间的体验成为成功的关键。在阿特伍德看来,身体空间是人性的原初居所,是比艺术审美更为可靠的人性磁石场。主人公通过身体空间事件,以一种批判的意志,抗拒着工具理性霸权对人性的侵蚀,并在身体与自然的融汇中实现人性的复苏。生育是小说中所有抗拒式的批判中最有代表意义的事件。生育原本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本源,是生命理应拥抱人性的神圣时刻,但是工具理性对其显示出霸权的摧残力量。“在机器发展已经转变为机器控制的地方,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趋向总是互相交织在一起,最后导致的是对人的总体把握”。^{[9]28}阿特伍德感受到了这种总体把握的无所不及,在作品中进行了深刻揭露,同时也指出了解放的道路。在现代化医院的分娩过程中,冰冷的金属机器碾压掉了人性的温情,生育只是社会机械化生产的一部分。只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人才开始从“性爱机器”^[12]和“生育机器”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因为在“非压抑条件下,性欲才能成长为爱欲”。^[13]主人公与爱人乔在月光沐浴下的树林里,通过自然界的气息恢复了爱欲的能力,她渴盼以自然的情感和肉体自主的方式孕育新的神圣生命,这令她的身心充满了神圣的灵性,又可以像儿时那样聆听并辨别各种鸟鸣,发现种种自然神光。在纯美古朴的大自然中,主人公获得了身心的解放,完成了人性的复苏。

主人公的自我救赎之旅正是追求完全摆脱工具理性控制与机械文明秩序规约的进程,是实现按照自我心性与愿望支配自我身

体空间的过程。人性救赎的过程,就是解除束缚,走向自由的历程。然而,什么是自由?以赛亚·伯林认为自由要看“谁决定我的行为、生命?我是否能自由地依我选择的方式行事?或者,我是否处于别的控制力量的命令之下?”^[14]所以,只有自己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时候,人才是自由的。除了生育,必须保有自由的还有婚姻。小说中主人公不但与把自己作为孵卵器的丈夫离异,也拒绝了男友乔的求婚。因谁在“妻子”那个空间位置,对于乔并没有区别。更何况在主人公的体验中,婚姻只是填写姓名、年龄、血型、誓言等等一堆表格的契约行为,文明秩序将两人以夫妻的名义,以社会构件的成分彼此连接在社会关系的空间位置中,无可否认“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理性造成了民众的生存困境,使人物化或异化,使人性逐渐丧失。社会的模式化和齐一化,把人当做社会大机器中随时可以替换的零部件”。^{[15]90}当爱情被工具理性所规约时,人性的情感被社会功能异化,婚姻成为工具理性极权统治的制度化表现。因此对求婚的拒绝即意味着拒绝极权和控制。

在整部作品中,阿特伍德一再否定了审美现代性的乌托邦,却不得不栖身于带有浓浓乡愁的怀旧的生态乌托邦。这真实地反映出,当代工具理性所带给人类的反制危机的棘手性,恰如曼海姆所言“克服危机不能靠一些草率紧张的尝试来压制新生的麻烦问题,也不能靠遁入到已停滞的过去的安稳中。”^[15]人类的自我救赎必须在人类趋于毁灭的异乌托邦(Dystopia)的未来和永远停滞的过去之间,寻求可以真正容身的生存突破,一如主人公在生死交接处方能获得灵魂的涅槃一样。对此,《浮现》所映衬出来的思考,在工业现代化进程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依然是独到、深刻而犀利的。

参考文献:

- [1] 汪民安. 文化研究关键词[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 [2] Marcuse Herbert. *On Dimensional Man* [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07: 3.
- [3] [法]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与政治[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4] [法]让·波德里亚. 美国[M]. 张生,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31.
- [5] [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浮现[M]. 蒋立珠,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6] Harvey David. *The New Imperialism*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42.
- [7] Lefebvre Henry.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1: 9.
- [8] Giddens Anthony.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M].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77.
- [9]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 西奥多·阿道尔诺. 启蒙辩证法[M]. 渠敬东,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6.
- [10] [德]瓦尔特·本雅明.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M]. 许绮玲, 林志明,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61.
- [11] 汪民安.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23.
- [12] [美]马歇尔·麦克卢汉. 机器新娘——工业人的民俗[M]. 何道宽,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191.
- [13] Marcuse Herbert.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M]. Boston: Beacon Press, 1974: 222.
- [14] [美]以赛亚·伯林. 自由论[M]. 胡传胜,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371.
- [15] Mannheim Karl. *Ideology and Utopia* [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54: 96.

Criticism of the Hegemony of Instrumental Reason in *Surfacing*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Theory

WANG Ying-jun

(*Postdoc Statio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The hegemony of instrumental reason has roots in modern man's excessive worship of knowledge and technical products, and is embodied in the pursuit of absolute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which has resulted in the devaluation of human emotion and the alienation of m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modern space theory, with the influx of capital, such alienation expands from cities to the countryside and from developed regions to the developing ones, and is manifest in the invasion of the rural space by mechanical civilization. This makes human redemption an important concern of modern age. In her novel *Surfacing*, Margaret Atwood vividly depicts the expansion of alienation due to the hegemony of instrumental reason and while offering a powerful critique of the hegemony, she also suggests possibilities for human redemption through a return to nature. Hence, *Surfacing* is to be read not just a work of ecofeminism but as one that has greater relevance to us in a world of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instrumental reason; hegemony; natural ecology; space; *Surfacing*

(责任编辑: 魏琼)